

专家视点

未来十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

□ 徐 坚

未来十年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和妥善运用我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机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与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机遇相比,我国在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具有内在承继关系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在背景、条件和内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是前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简单延续。

我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与前十年之间的承继性,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和平、发展与合作作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国际环境依然有利于中国继续推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事业。其二,中国积极运用本世纪头十年发展机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未来十年继续享有重大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既是世界经济的繁荣期,也是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大发展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势头之强、影响之深,近代以来绝无仅有,堪称世界发展五百年未见之巨变,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了不起的成就。在新兴大国中,中国取得的成就最引人注目,经济规模由世界第六跃居第二,出口、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工农业许多重要产品产量都进入世界前列,人均收入水平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市场规模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之一。这些成就为我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构筑了必要的机制平台,为中国驾驭未来十年发展机遇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与此同时,与21世纪头十年相比,未来十年我国战略机遇期在性

质上有重大差异,本质上是中国发展转型升级的机遇,不是头十年那种粗放型总量快速扩张的机遇。这是最本质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追求总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侧重内涵质量提升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趋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将是中国政府职能、经济结构、产业政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

中国战略机遇期出现的新变化,是国际国内环境倒逼和推动的结果。从国际背景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发展环境对中国延续传统发展模式的吸纳空间日益接近极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深陷赤字危机和债务危机,国际市场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欲继续通过大幅提升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已无可能。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渐入深度变革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博弈和竞争更加激烈,其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不断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造成重创,发达经济体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加剧,西方扭转国际游戏规则中对其不利因素的诉求越来越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围绕国际秩序变革的博弈最终必然只能达成利益妥协,中国要引导和适应国际秩序变革大势,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发展方式转型不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种全球性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各类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发展瓶颈,不仅发达国家出现发

展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短板也相继显现,有关新兴大国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都在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新途径,通过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机制变革摆脱发展困境或超越发展瓶颈,改革、转型和调整成为各国普遍面对的一个共同主题。中国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在发展转型问题上走在前列,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趋势不仅是国际环境推动使然,更是国内环境倒逼的结果。随着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成本上升、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过去十年规模高速扩张型发展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由于未来十年战略机遇期更多是国内外环境倒逼中国发展转型的结果,是传统粗放型、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难以以为继的产物,因而相比前十年,中国运用未来发展机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不进则退,紧迫性明显大于前十年。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虽然也面临不少挑战和风险,但问题主要来自外部,如台海形势危机可能使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被迫中断,而中国发展方式产生的内在风险在当时并不十分严峻。相反,未来十年,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上述问题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干扰和挑战总体上更加趋于可控,而我国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诸多内在矛盾、障碍和困难所构成的风险、成本则急剧上升。

相比前十年,驾驭未来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复杂性、艰巨性将明显上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未来十年是国际权势重构的关键时期,伴随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和重新分布,国际形势将出现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和地区秩序在加速变革过程中有可能呈现总体有序、局部失序的特点,世界经济转型中的风险因素与国

际环境变迁中的不确定因素总体在增多。外部环境的多变性给我国带来的挑战有增无减。其次,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期待、责任、压力和挑战将明显增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加容易成为国际矛盾焦点。在国际权势重构背景下,许多前十年未曾出现或并不突出的问题,成为当前及未来十年面临的新问题或迫切问题,包括中国在国际体系调整中的定位、中国如何引导周边区域重构、“全球公域”问题、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形象提升等。最后,未来十年国内外环境互动将更加密切、深入和频繁,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趋势。如何增强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中国将面临更大考验。

能否妥善运用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是重大考验。从主客观因素看,中国拥有战胜各种压力和困难,把握重大发展机遇,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实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通过深化改革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通过扩大开放和加强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的能力来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基础良好,潜力巨大。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社会保障体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体制、居民消费能力等,有很大改善和提升空间;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日益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在世界经济增长中与日俱增的引擎作用,为中国加大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积极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强大后盾。最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策实践表明,中国政府有决心、有能力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为用好中国发展机遇出现的重大机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环境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负责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学人随笔

“知识报国”是学者的使命

郑永成

宋代理学家张载将学者的使命归纳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末清大思想家顾炎武则提出“君子之为学,是明道也,救世也”,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就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形成了知识报国的深厚传统。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千年大变革时代。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科技进步、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不仅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世界。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学者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也即知识报国,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学者智慧,世界发展需要中国经验。

坚持实践性,是知识报国的基础。实践出真知,只有源于实践的理论才能高于实践并用以指导实践。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堪称典范。费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年逾九旬还坚持深入乡村社区调研,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学领域打上中国烙印的奇葩,并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更可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行为准则。

坚持建设性,是知识报国的基点与归宿。学者必须要有批判精神,人云亦

云不可能推动学术发展与文明进步,但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是唯愿国家越来越富强,百姓越来越幸福,这是学者应有的良知与情怀。大变革时代需要批判者,更需要建设者,但凡有利于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无论哪种场合都不隐讳自己的不同观点,都能从积极建设的角度来陈述自己的主张,这才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当代学者。

坚持辩证性,是知识报国的正确途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甚至多面性,对现实一味地否定和一味地肯定都不客观,只有辩证地看待发展中的问题,才能建设性地解决好现实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学者的理性建言有益于国家健康发展,而极端主义却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如农民工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收入差距是从共同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其首先代表的是发展与进步,但两者又确实到了需要妥善解决的时候,这就是辩证法。

总而言之,当代学者生逢大时代,任务艰巨、使命光荣,确实需要超越左右、超越虚无、超越极端,真正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富强和民生福祉不遗余力地贡献才智。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研究与对策

“两新”组织党建科学化难题与对策

□ 祝全永

当前,“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存在三大难题,即组织基础、工作基础和工作对象的思想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强有力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受到产权属性的制约。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对症下药,顺势而为。

首先,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党组织与行政决策层的关系。这是确保党组织作用发挥的首要环节。党组织要全力协调和支持“两新”组织依法行政、依法运作和依法发展,积极主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党组织要帮助行政决策层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促进“两新”组织持续快速健康和谐发展。

监督职能与发展职能的关系。党组织要紧扣“两新”组织持续快速健康和谐发展的中心工作,积极寻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规要求与“两新”组织发展实际的结合点,注重向决策层和管理层以及广大职工群众宣传、阐释党组织的意图,实现目标同向、行为同步,形成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活力。要深入实际调研,广泛听取党员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围绕关系“两新”组织发展方向和决策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增强党组织在“两新”组织决策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其次,需要实现“四个整合”:制度资源与党组织的规范整合。社会转型期,我党不仅要继承历史性的制度资源,还要挖掘新的制度资源,将国家政治生

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纳入法治化轨道。要积极开发和利用“两新”组织党组织制度资源,将党对自身和经济社会的整合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依靠党组织制度资源,实现党组织规范整合。

政策有效性资源与党组织的利益整合。抓住党组织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心理需求和社会利益需求的双重渴望,通过制度创新加以满足,积极理顺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并确保社会和谐发展,是“两新”组织党组织社会整合必须解决的问题。“两新”组织党组织在尊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利益激励机制作用的同时,要充分注重社会利益分化带来的利益纷争和社会公平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意识形态资源与党组织的价值整合。执政党在追求政策有效性时,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问题,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关注传统的现代转换和符合公共利益的民族主义。“两新”组织党组织思想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要充分开发利用我党意识形态资源,实现党组织价值整合。

组织资源与党组织的组织整合。“两新”组织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是完善党的组织网络、提升自组织能力,藉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在实现社会整合、提升自身执政合法性时始终关注党自身的组织资源。党组织如何处理与日益“归位”的“两新”组织的关系也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纯粹的党组织间的层级节制和上下级关系不完全适合处理党与“两新”组织的关系,协商、参与、共赢和制度化等应该成为党组织整合必须坚持的原则。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提高‘两新’组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信息速递

“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本报讯(记者王璘)今年以来,武汉大学程虹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自2013年5月正式发布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国家质检总局专门以质检总局简报反映质量观测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项目阶段性成

果之二《关于以××集团为平台整合质量服务技术机构 加快发展我国质量服务产业的若干建议的专报》,提出“以××集团为平台整合国内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技术机构,先行先试,为我国质量服务技术机构的大规模整合,探索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的政策建议,再次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成果选介

一部开拓公羊学研究的鼎力之作

——读黄开国著《公羊学发展史》

□ 陈居渊

黄开国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公羊学发展史》,作为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之一,已于今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以公羊学的发展史为经,以公羊学理论内涵为纬,经纬交织地剖析了公羊学的历史演变。全书将公羊学的发展史分为形成、兴盛、成熟、衰落、复兴、嬗变六个历史阶段,揭示了公羊学在不同阶段的境遇、理论内涵与特点。该书篇幅浩瀚,蔚为大观,宏观上包容纵览自先秦至近代长达两千余年的公羊学发展史,微观上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公羊学家的公羊学思想,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公羊学通史。

首先,脉络清晰与注重学理相互辉映。该书以深入浅出文字,透彻阐释了公羊学的源与流,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质和代表人物,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主线脉络清晰。作者特别注重学理的梳理。例如,在比较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学理论之后提出,董仲舒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公羊学者,注重王道的政治关怀,带有神秘化的色彩;何休的贡献则是将神学上作出系统总结,但却导致了春秋公羊解释灵活性的丧失。如果说公羊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分析

是在横断面的静态中进行的,那么公羊学理论的过程探索则在纵断面的动态中进行的,作者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准确地论证了公羊学说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经学学说,一部公羊学史就是一部古代经学与政治的诠释史。

其次,高度综合与深度分析相得益彰。该书不仅在前言中对公羊学的六个历史阶段作了总体概括,每章之前还有简短的“概说”,对每个历史时期公羊学的思想特点及其社会背景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解说,多角度、多层次地彰显公羊学发展、演进的规律。例如,在探讨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时,就注意到了当时经学派别的学派之争,即汉宣帝时的公羊学与谷梁学之争,从而深化了对董仲舒公羊学思想的研究;在论证清代诸家公羊学者的思想时,注重追述了他们与考据学的渊源关系,透视出深邃的哲学底蕴,使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贯穿于全书。每位公羊学家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有血有肉、内容充实的公羊学发展史。

再次,历史观感与新意迭出互见其妙。在古代经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公羊学者都标榜自己是圣人之道的发展者。可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互相对立、彼此指责,有的甚至肢解公羊学的重要理论,争论不

休,从而在公羊学的延展史上留有一些悬案或者有待商榷的问题。作者则通过对卷帙浩瀚、纷繁杂驳的公羊学著作和资料的收集、梳理,作出了严谨细致的考辨。例如,提出《公羊传》为齐学《春秋》先师的共同成果,准确的命名应该是《齐春秋》;并用文王之王的核心观念,贯穿《公羊传》的整个思想诠释;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是其以改制说替代儒学的革命说,奠定了公羊学的主要思想内容与经学诠释的重要方法论。又如,强调清代公羊学的理论复兴,有一个从重大义到重微言的发展过程,刘逢禄等人复兴的主要是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且带有乾嘉汉学的学风影响;龚自珍、魏源的公羊学没有梁启超所说的以经议政的内容,但他们是从小刘逢禄到廖平、康有为过渡的中介;而廖平、康有为的公羊学才真正回到西汉的董仲舒,尽管廖平迷信孔子与孔经,康有为则利用孔子改制说,但二人的经学都带有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古今中西融合的特点,反映了经学的终结。这些观点,都体现出作者以哲学的力度和史学的厚度,对两千余年公羊学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答卷。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作者通过博考历史文献,细考历代争议,对历史上的班固、何休、范晔、郝经、章如愚、阮元等人及近现代的梁

启超、钱穆、冯友兰、徐复观等学者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代之以理据充分的新解,均发前人所未发,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亮点。

该书是一部开拓性著作,前无借鉴,难免出现某些不足和疏漏。比如,有的章节关于某个特定问题的论述,似乎过于简略;引述某些观点时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辨析,这样将显得更为丰满完善。总之,瑕不掩瑜,《公羊学发展史》是经学史研究中极具探索性、开拓性的成果,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传统经学特别是公羊学的认识,对当前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创新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